

# 文化扶贫：“输血”重要，“造血”更迫切

陈 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扶贫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举全党全国之力推进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和强调文化工作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性,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扶贫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指出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以下谈点粗浅的学习体会。

## 文化扶贫工作在大扶贫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广泛的调研和深厚的实践基础之上,有着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其中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理念是指导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理论法宝。

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考察扶贫开发工作,他指出,阜平“发展旅游业大有潜力。”2015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把生产条件改善同生活条件改善统一起来,把生产和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统一起来,最大限度调动当地群众的积极性,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考察易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情况时,又提出扶贫工作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从中能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谋划扶贫工作这个大格局时,一直高度关注和始终关怀着文化和旅游工作。

## 文化扶贫的主要内容

文化扶贫有哪些主要内容呢?

一是扶贫先扶志。为了补齐扶贫工作中的精神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过:“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

二是扶志必扶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扶贫先扶智,绝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坚决阻止贫困代际传递。”

三是治贫先治愚。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中提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在2015年3月两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代表团审议时曾语重心长地提出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扶智先治愚,就是要消除观念上的贫困,扶贫必扶智就是扶持智力上的内在动力,扶贫先扶志就是要补齐扶贫工作的精神短板,提升精神上的自信。

## 做好非遗扶贫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目前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到两年,扶贫工作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扶贫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扶贫需要越来越精准。

如何帮助最后的4000万人民脱贫,如何翻过扶贫工作的最后一座大山,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一般来说贫困地区大都是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但是这些贫困地区拥有风光秀丽的自然遗产、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化遗产和异彩纷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让这些丰厚的自然、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资源进入扶贫工作中去,是一个庞大的很有价值的课题。就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说,非遗在过去的扶贫工作中做过不少尝试,也取得过不少成绩。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青海黄南州热贡画院,采用“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培养了600多位唐卡艺人,其中培养孤儿、贫困学生,每年创作唐卡3000余幅,带动周围群众脱贫。又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海南锦绣织绣实业有限公司,是黎族传统纺织染织技艺的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多年来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举办黎锦技艺培训班,培养了传承人3000余人次。再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衡水习三内画艺术有限公司。内画鼻烟壶是这个基地的主打产品。基地现拥有40多名中高级工艺师,创办了习三工艺美术中等专业学校,已陆续培养出了2000多名内画毕业生。衡水地区生产的鼻烟壶年收入就超过10亿元。这些地区都是利用得天独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孕育了绚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国务院公布的四批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看,其中西部八省区就占425项,除一个项目被多个地区拥有外,这八个省区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的30%左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扶贫工作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就具体内涵来说具有相互交融的内容,特别是我国老少边穷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能为扶贫工作提供精神内涵和智力支持,将会有力地促进扶贫工作。

现在看来扶贫工作中“输血”是很重要的,不过从深层次来说“造血”更为迫切。可喜的是去年非遗扶贫工作得到了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重视。文化和旅游部在去年6月出台《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两部门联合出台《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大力推进扶贫就业,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提出两部门以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为重点,兼顾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级贫困县,选取确定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等10个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政府有关部门大力组织和热情关心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战中,在大扶贫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让更多的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在传统与现代的推移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程光耀

1月16日至19日,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赣州市人民政府、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办,赣州市委宣传部、赣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协办的“张曼君与中国现代戏曲”学术研讨会暨张曼君作品展演活动在赣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戏曲界的领导、理论工作者及艺术家在四天时间里参加了四场研讨会,观摩了天津评剧院的《红高粱》、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团的《花儿声声》、湖南省湘剧团的《月亮粑粑》、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小乔初嫁》四部张曼君导演力作及赣州采茶戏研究所演出的一台精品小戏。

著名戏曲导演张曼君以赣南采茶戏为起点,将现代戏曲的创作拓展到众多戏曲剧种。作为赣南采茶戏第一位获得梅花奖的戏曲演员,她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戏剧导演,正如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池红所指出的,张曼君为赣南采茶歌舞剧带来勃勃生机,奠定了江西采茶戏在全国“采茶园”中的领军地位,也为中国戏曲的创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林琳提出,张曼君作品挖掘剧目深刻的思想内涵,赋予剧目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丰富了地方戏的表现形式,善同领军者切磋互鉴,相辅而行,这让她成为中国戏曲界有广泛影响力的导演之一,是近10多年来驰骋活跃、辛勤耕耘在地方戏创作舞台的佼佼者、领军者。

张曼君在开幕式上回顾了自已从赣南走向全国的艺术履历,围绕数十年创作所秉持的艺术原则——作品共有的民间气质、诗化的美学思维形态、现代性的艺术追求、“活动的人物形象”的技术形态以及整合性的舞台表现力等,深入阐述了以“人学”为基础的戏曲创作,激发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认同。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相关话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与回应。

与会者认为,张曼君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戏曲创作不断探索进程中极具时代意义的艺术家,对张曼君及其作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总结与回顾近20年来现代戏曲创作的艺术轨迹,



会议现场

有助于对整个中国戏曲现代化进程进行深度把握与文化观照。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薛若琳从剧本文学到舞台艺术的创作过程入手,就张曼君对灵动人物的塑造、灵动情节的设置以及追求抒情式戏剧冲突、风格的创作理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概括。中国剧协副主席季平提出,现代戏曲创作不只是涉及表现当代生活和当代人物的艺术问题,更是关涉到怎样运用传统的戏曲样式进行表达。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以“意趣神色”的美学观点概括张曼君的舞蹈美学追求与创作精神。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也认为,张曼君对戏曲程式系统的化开与松动、对戏曲本质和本体的回归、对民间戏曲的艺术样式以及现代歌舞叙事形态的艺术彰显、对作品中表现主义手法的深入探索研究。张曼君所力图呈现的,是中国现代戏曲一种新的形态学本体论的价值尺度,张曼君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戏曲新文体的重建者。他同时提出在今后的现代戏曲探索中,戏剧标准和美学标准应大于、高于剧种标准,好不好不问题永远高于、大于像不像和是不是的问题。中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面对当前全球化的社会背景,面对着

当下多元化、多样态的艺术环境,提出希望有更多像张曼君一样的导演在继承与发展的道路上共同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当代表演艺术学派。戏曲理论家王坪章认为,对现代戏曲的创作需要理性、冷静、探索性地分析与考量对高度程式化的戏曲所进行的“新歌舞化”与“再民间化”。

透过“张曼君现象”,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孙豹隐认为,在当下戏曲创作中传统音乐、戏曲式舞蹈及戏曲与观众的密切联系等方面,导演行业发挥着重要作用。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苏勇提出张曼君成功地构造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诗性现代戏的舞台范式,这种诗性现代戏为我们现代戏的创作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范式。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李珍则提出张曼君的艺术作品是“形象种子”与抒情诗剧融合创造而出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伟认为我们应该回归到戏曲的本体认识,张曼君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戏曲新文体的重建者。他同时提出在今后的现代戏曲探索中,戏剧标准和美学标准应大于、高于剧种标准,好不好不问题永远高于、大于像不像和是不是的问题。中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面对当前全球化的社会背景,面对着

上述专家对于张曼君在中国现代戏曲创作中的作用、价值和独特的

个性风格,给予了高度认可,也回应了随着张曼君作品伴生的理论命题。针对张曼君导演艺术的技术手段创造和艺术思维创新,研讨会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会长黎继德从导演思维、人物刻画、舞台形式的建构等方面对张曼君导演艺术进行阐释,认为张曼君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古今中外各种艺术形式来书写舞台。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王绍军从传统戏曲表演意象的角度来分析张曼君作品的艺术表达方式。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郑雷从叙事学角度来分析张曼君的戏曲叙事艺术。同样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研究员熊姝从民间音乐与舞蹈元素的植入与运用来总结张曼君现代戏曲形态的舞台观。其他专家如王亚勤提出“新歌新舞故事”脱胎于新音乐演故事,张之薇总结的张曼君作品“以善为底、以民间戏曲传统为体、以开放的艺术观念为用”,都深入挖掘了张曼君艺术创作的文化底蕴。

张曼君在50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50部戏曲作品,深入地挖掘她的创作思想,离不开对其作品个案的研究与分析。曾宪林、彭维、陈法玉、王静波等专家学者结合多部作品进行了阐释。会议闭幕式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旭认为,张曼君的创作充分展示了对人的价值、尊严的高度尊重和理解,悲悯情怀浸透舞台,甚至在悲情化的舞台书写中展现人性骨子里的悲壮,形成独具人文关怀的生命戏剧。张曼君在传统与现代的推移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品呈现出浓重的“风诗”风格,走出了现代戏曲创作特别是现代戏创作中的诸多艺术瓶颈与困惑,形成高度个性化的艺术范式,推动着现代戏表演体系趋于成熟。张曼君是独步当代的一位师者,引领着中国现代戏曲创作发展的方向。

喜逢新时代,是我们川剧人的幸运。怎样做,则看我们的作为。对剧团和戏剧人而言,最根本的,还是陈云同志早年提的要求:出人出戏走正路。

引一则友人前些时候传来的信息:去年5月,川剧题材电影《活着唱着》开机,邓婕监制,张国立站台。邓婕是川人,还是川剧从艺者出身。他们夫妇二人对川剧的热爱和关怀,对川剧现状和前景的担忧,那派赤子之心,坦露无遗,令我这个同乡、一辈子热爱川剧的老文化人,深深感激和无比敬佩。或许,这也叫相同的乡愁吧。

如实地说,“振兴川剧”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相对于各地方剧种而言,是提出较早的,还设有专门的机构督办。基于种种原因,却是收效甚微。如今,整个四川全省能演出一台大戏的川剧团仅仅五六个,加上重庆现存的两个(重庆市川剧院和坐落于万州区的三峡川剧团),总共七八个而已。而就重庆市说,上世纪80年代初,县、区级国办川剧团还有30多所!人才大量流失,川剧经历了阵痛的时期。

幸运的是,现今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事业的好政策,给文艺带来了又一个春天。川剧,自然也幸运地享有这一春天!

对此,我有深切体会:一是前些时日闭幕的四川省川剧艺术节,想不到竟然有20多台新创剧目参演!许多团原本人手不齐、缺少少柱、名存实亡,是延请现存的川剧没用上的骨干或退休艺术家领衔,共推新戏;不少民营剧团也顶了上来;有的更是强强联手,打造佳作。去年11月初我在成都就看了川渝高手联合推出的《金沙江畔》。编剧周津菁、总导演胡明克都来自重庆,制作方却是四川省川剧院,突破门户,资源共享,着眼大局,共攀高峰,这不是基于当前剧团稀少的权宜之计,而是带有演艺新特点的未来模式,给人以鼓舞和启迪。热气扑面而来,深深感染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形象地感受到了川剧新时代获得的发展机遇和前进的壮阔气势。

说到川剧新时代,我认为,首先要对“新时代”有正确的理解。这个“新”,不是通常说的“新一天”的“新”,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

我以为,剧团和从业者们,只有把准政治方向,心明眼亮不迷茫,才能在前途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明辨是非美丑,抵制邪恶诱惑,才能在新时代走得更稳当、更坚定、更自觉。

喜逢新时代,是我们川剧人的幸运。怎样做,则看我们的作为。对剧团和戏剧人而言,最根本的,还是陈云同志早年提的要求:出人出戏走正路。

先说“出人”。戏要人演,着力培养出色的演艺人才。从总体看,川剧人才还有重大的短板:编剧和导演人才奇缺。就编剧说,《金子》的出色编剧隆学义已仙逝,卓有成就的川剧编剧大家徐棻、魏明伦、谭德等均已高龄。接茬的年轻人尚不成熟,大有青黄不接之慨。导演更是,原本戏曲导演特别是川剧导演就紧缺,如今,大师级导演谢平安已故去,同为著名导演的胡明克、任庭芳也已老矣,更加青黄不接。只好就戏曲人才建设而论,我为急迫的是培养编、导人才,解决青黄不接,急补短板!殷切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尽快做出实效。

次说“出戏”。重庆川剧院推

## 快言快语

冯巍(青年学者):近十年以来,艺术创作与艺术传播的大发展、大繁荣,艺术教育行业赢得的巨大政策自信,共同点亮了艺术的总体未来图景。仅就文艺批评而言,历经了最初数字化的犹疑和兴奋,又历经了一段时间波涛汹涌、大浪淘沙的冲击和沉淀,目前看来,其自身的反思已然开始。这不仅意味着数字批评的积累已具有较为成熟的形式、较大规模的数量,以及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们对于数字批评的未来拥有了更为理性的期许。尽管媒体是“传统”还是“新”,都只是作为一种介质而存在,但介质的变化确实能影响并改变文艺批评,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就必须正式踏上征途,为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王嘉(青年评论家):戏曲受众的萎缩或许不是青年人看不懂,而是戏曲剧目的创作水平、思想形态已经落后于受青年人青睐的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已经无法吸引青年人。时代变了,受众变了,思想变了,戏曲若还在走老路子,戏曲就会越来越走向小众。非吐故纳新。在当下艺术创作问题积累的经验来看,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作为创作动力,加强前期项目论证,矫正扭曲了的创作目的,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强化人民观念与立场,才能实现创作与欣赏的有效呼应。

# 川剧当自强

康式昭

出的《金子》,堪称川剧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佳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戏曲史的一座里程碑。《李亚仙》《友朋记》是为古代题材的佼佼者,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最近推出的革命题材川剧现代戏《江姐》,则充分显示了剧院的眼光、胆识和担当。空政文工团歌剧团编创的歌剧《江姐》,已经成为保留的经典,难以企及,改为川剧,很可能要冒费力不讨好的风险。但江姐是重庆的骄傲,宣传讴歌江姐是重庆川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歌剧《江姐》更是借助川剧的音乐元素而成功……这一切,启示和鼓舞了他们选择移植改编的决心。他们成功了。

在“出戏”方面,当前要注意的是,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尽力遵从艺术规律,不满足于打造宣传品,而力求推出艺术品。豫剧《朝阳沟》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它写的是城市女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村青年的结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但剧作家杨兰春志存高远,决不敷衍应付,挖掘生活底蕴,遵从艺术规律,极力打造“立得住、留得下、传得开”的艺术精品,创造了新中国演艺史上的奇迹,行内称之为《朝阳沟》现象。个中的经验,引人深思。照我看,川剧《金子》也具有这样的潜质,愿它永远保留在舞台上,常演常新。

剧目建设上,还有一个常常遇到的问题:写好人好事。每当出现好人好事时,地方领导总会要求剧团搬上舞台,予以宣传。这种宣扬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事,理当成为剧团的职责。但我以为,要区别对待,看看有无戏剧性。文艺宣传的样式很多,比如,勇救落水者而牺牲的英雄,就可以写长诗、报告文学的方式褒扬,或者在救人的岸边塑像,供民众瞻仰。写戏,务需遵从戏剧艺术规律。

再说“走正路”。毋庸讳言,市场环境不乏使人走偏方向的诱惑,说严重点,充斥着让人沉沦的陷阱。这里,绝对要牢记习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告诫:“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自觉地杜绝低俗、庸俗、媚俗。自觉地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而崇高的职责。

“走正路”云云,涉及的问题尚多,不一列举。遵循“艺精德高”的总体要求,不忘初心,谨慎戒行就是了。